

MAKESI DONGFANG SHEHUI LILUN YU
ZHONGGUO FAZHAN DAOLU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 中国发展道路

黎世红 等著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

MAKESI DONGFANG SHEHUI LILUN YU
ZHONGGUO FAZHAN DAOLU

ISBN 978-7-01-021747-5



9 787010 217475 >

定价：76.00元

MAKESI DONGFANG SHEHUI LILUN YU
ZHONGGUO FAZHAN DAOLU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 中国发展道路

黎世红 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广庆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黎世红 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01-021747-5

I. ①马… II. ①黎… III. ①马克思主义-东方国家-社会学-理论研究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A811.64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99135 号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

MAKESI DONGFANG SHEHUI LILUN YU ZHONGGUO FAZHAN DAOLU

黎世红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7-01-021747-5 定价:7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预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但中国历史并未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轨迹演进。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以来的发展道路就不同于欧洲国家,表现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规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成绩,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东方社会理论为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规律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为依据,从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视角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对于认识和探索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理论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研究视角主要注重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殊规律,即注重中国近现代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历史条件和中国共产党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视角,而忽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就不同于欧洲国家,忽视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古代历史贯通起来去探究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忽视在中国历史整体性视角下分析中国道路的历史依据。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①历史发展具有继承性,中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9—40页。

国历史的特殊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又遵循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体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不能忽视中国 5000 年文明史的视角。中国历史道路遵循本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古代历史来看,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就不同于欧洲国家;从近代历史来看,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却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通过特殊的民主革命道路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近代中国历史道路是古代中国历史道路在特定条件下的逻辑延续。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道路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早年重点关注欧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进行分析,提出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之一提出来,这为分析东方社会的历史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东方社会只能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东方社会自然经济占优势,这种自然经济的特征是:土地公有、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固定的分工,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亚细亚农村公社的社会生产机体‘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生产者不能摆脱氏族或公社的脐带,从其客观条件的原始共生状态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及其特殊的内在机制和狭隘的社会生产关系严重地抑制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品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形成”^①。亚细亚社会的特殊结构决定了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社会。

在东方社会理论的视野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不同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西欧社会。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阶段,未能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是一个灾难深重的社会,但也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成功地越过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由于对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把握不准,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出现严重的曲折,但中国逐渐走上了适合东方大国农业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奇迹。

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未来方向,而且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预示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生命力。中国的发展不仅在于改变中国,更重要的是影响世界的未来。

谈到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原因时,人们使用得较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国情”。对于“国情”的概念,不同的认识主体也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论著认为:“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相统一的社会形态,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发展道路。”^②谈到“国情”问题,人们自然想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却往往忽视了相关联的几个问题。首先,对于“国情”问题,人们自然把当代中国与外国进行区别,那么,中国古代的国情与外国有没有区别呢?既然当代中国国情不同于西方,那么,古代中国国情是否也具有特殊性?其次,人们已经认识到当代中国国情不同于外国,那么,未来的中国是不是就与

① 谢霖、谢静静著:《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7 页。

② 郑德荣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 页。

外国没有国情上的差异了呢？最后，“国情”这个概念往往在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后才会受到重视，为什么在遭受挫折前不能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又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概念，既能够区分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又能够区分近代和当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甚至还能够区分未来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呢？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东方社会”这个概念。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东方社会”的概念不仅能反映中国近现代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也能反映古代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国情，未来的中国社会也将存在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所以，“东方社会”的概念能够反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概念不能准确反映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的差异。诚然，东方国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但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主要在于区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因为西欧国家从近代以来引领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西方国家掌握了一切学术话语权，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来说，旧中国被国外科学家宣称“贫油”，似乎中国就没有石油了，而由于中国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石油勘探没有取得成绩，中国的石油供应和消费就只能依赖外国。这种科学话语的霸权实际上就是让中国接受西方国家的宰割。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话语权就更不用说了，各种西方学派都希望中国人按照西方的理论改造国家。20世纪20年代，西方哲学家罗素、杜威等人都到中国来宣扬他们的思想。由于近代中国屡次被西方打败，中国人把一切救国的希望都寄托于学习西方。历史证明，只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需要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就是中国的东方社会特点。

本书的目的不是研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不对有关东方社会理论的学术观点进行讨论，而是借助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所提供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启示，考察中国近代以来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轨迹，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功都符合东方社会理论要求的历史启示，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遭受的挫折都背离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教训。过去，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将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仍然不会失去特殊性。不可回避的中美贸易战再次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需要中国人民的探索,在欧美学不到中国未来的道路。这就是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和认识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的结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1
第一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	1
一、亚细亚问题的由来	1
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化背景	3
三、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历史发展道路的思考	19
第二节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22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	22
二、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学术理解	26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意义	34
第三节 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道路的特殊性	43
一、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道路的特定条件	43
二、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道路不适合东方国家	46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社会发展道路选择	49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东方社会特征	49
一、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49
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55
第二节 近代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原因	61
一、中国未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	61

二、近代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	63
第三节 近代中国各阶级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	67
一、农民阶级救国方案的失败	67
二、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失败	72
三、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	75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创造 条件	80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背景	80
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86
第五节 东方社会理论视野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93
一、国民革命道路的失败	93
二、东方社会条件下的中国革命特殊道路	95
三、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101
四、关于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理论	105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早期探索	110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中华共和国”预言实现与新民主 主义社会开端	110
一、马克思恩格斯“中华共和国”预言实现	110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	115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116
第二节 东方社会理论视野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20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理论	120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道路	125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 进程与经验	133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 进程	133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 经验	137

第四章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探索	142
第一节 在东方农业国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142
一、社会主义苏联模式.....	142
二、东方农业社会的现实基础.....	146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提出.....	152
第二节 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	155
一、改革开放的方法论.....	155
二、改革开放在摸索中前进.....	160
三、“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168
第三节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7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17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接续发展.....	17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179
第四节 在开放环境中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181
一、苏联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经验教训.....	181
二、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185
三、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	191
第五节 东方社会理论对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意义.....	192
一、东方社会理论揭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 规律.....	192
二、东方社会理论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 指导.....	195
第五章 在东方社会国情基础上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	198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198
一、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探索.....	19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204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21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	21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逻辑·····	217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逻辑·····	221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22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224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28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	232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237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37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内容·····	246
第五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24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24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253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258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道路·····	266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26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由来与演变·····	266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内涵·····	274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确立的依据·····	278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285
一、中国道路符合东方社会特殊规律·····	285
二、中国道路的成就·····	289
第三节 东方社会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相统一的发展道路·····	294
一、社会主义代表人类的未来·····	294
二、中国道路符合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	303
三、中国道路符合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	305
四、世界历史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的统一·····	306
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17

第一章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第一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

一、亚细亚问题的由来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理解东方社会形态的关键。19世纪是西方殖民活动狂飙突进的时代,此时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对东方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敏锐地发现饱受殖民苦难折磨的亚洲,其古代社会有着与西欧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自己第一部公开发表的政治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就此,马克思将亚洲社会的特殊性纳入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论之中。

从19世纪中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到21世纪的今天,学界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多争议。这部分是因为概念本身的模糊性。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论断散见于各类著作与报纸文章之中,他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从未直接使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一词,更未对其做出过专门的解释。直到20世纪初,这一名词才由列宁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团结大会报告中首次使用。^①更重要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涉及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判断,对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亚洲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的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禁要问,亚洲古代社会是不是一种有别于欧洲古代社会的社会形态?亚洲古代社会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它不存在欧洲那种奴隶制、封建制?如果被证明,亚洲的发展道路独立于马克思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序列,又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实现的可能?

具体来说,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首先源自苏联。早在1908年,普列汉诺夫便曾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前者并不必然能像后者一般,沿着古代—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条线索渐进发展。^②在这之后,以波格丹诺夫、瓦尔加等为代表的苏联学者相继就亚洲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了探讨。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让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在这个亚洲古国中的可行性产生疑问,苏联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由此进入高潮。^③苏联学者开展的这场辩论随后传播到了日本,并最终引起了中国学者与共产党人的参与,构成了后世所谓“社会史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上议程。从国内学术史本身来看,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相

① Marian Saw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p.83.

② 关于普列汉诺夫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参见[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③ 关于争论的具体内容,可参见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Marian Saw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pp.91-95.

④ 关于社会史论战的内容在此不过多赘述,可参见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联系的古史分期问题成为新中国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国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以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中国历史研究者都已从各个角度对该命题进行了十分详尽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主义浪潮逐渐退去,人文社科各领域的研究者纷纷开始反思以往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理论框架与视角,这为我们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福柯到萨义德,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在历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新思潮向殖民时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西方话语霸权提出挑战,认为传统的历史叙事大多从西方或者殖民者的角度书写非西方地区的历史。我们以往从经典史著中了解的东方,并非完全客观的,而是他们用刻板印象与偏见塑造出的一个西方化的东方。^①在阐明此中关节后,受新思潮影响的史学家开始超越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话语,真正从地方、本土角度思考非西方地区的历史。^②

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下,我们倘若拨开笼罩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上的各种话语迷雾,深入到其诞生的历史语境中,就可以看到亚细亚生产方式从属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而这一理论体系又是在几千年来西方社会所构建的各色东方观念的海洋中产生,并最终完成了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西方人的东方观形成演变过程的梳理,探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产生的内在理路,为增进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提供一份绵薄之力。

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化背景

西方人对东方到底是什么看法?如果不对相关概念做出适当的界

①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经典论述,可参见[巴]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可参见[美]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此类研究颇多,现仅列举几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定,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现实。毕竟,这里的西方与东方并非精确的地理概念,它们与地域相连,但却主要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指涉,并且在不同时间段所指的对象也各不相同。^① 尽管有争议,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化意义上的西方(Occident)传承来自三种主要的文化传统:其一,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其二,基督教传统;其三,标榜自由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崇尚理性科学的现代启蒙运动传统。^② 传统意义上的东方(Orient)则指西方文明以外区域。

在西方,东方与西方这两种观念的分野其实质是文化认同(identity)的问题。“东”与“西”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单独的东方或西方。一个地区的特定人群想要形成以上概念必须搞清楚“我们”身处何方,而相对于“我们”那些外来者处于什么方位? 这个问题则与一个民族对自身的认知直接相关。

现有的民族、历史研究认为,族群、民族对自己文化,民族身份的认识与认同的形成有赖于外部民族的刺激。唯有在一系列与外部群体的跨文化交流、摩擦、碰撞乃至战争的过程中,一个族群、民族对自身的认识才会加深,认同才能够变得稳固。^③ 文化、民族认同的核心问题是回答“我”(我们)是谁,它与文化(文明)边界的确立与内外差别的形成直接相关。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民族对自身都有一些定性的描述,但大多数的描述都无法独立于其他外来文化、民族这个他者存在。譬如,在日常语境里中华民族被描绘为,居住在遥远的东方、拥有悠久的历史、人民勤劳勇敢。

① 例如,古代日本可以算作东方的范畴,但近代强调脱亚入欧并在二战后与美国结盟友关系的日本,在当代政治语境中有时也被划作西方。

② James Kurth, “Western Civilization, Our Tradition”, *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all 2003. 也有学者认为西欧文明的三个传统是古典传统、基督教传统与日耳曼传统,见侯建新:《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

③ 关于他者在民族认同形成中的作用,参见 Nick Hopkins, Neil Murdoch, “The Role of the ‘Other’ in National Identity: Exploring the Context-dependence of the National Ingroup Stereotype”,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Vol.6, pp.321-338。精彩的个案研究,参见 Linda Colley, “Britishness and Otherness: An Argument”,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31, pp.309-329.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London: Pimlico, 2003。